

从内外之分走向知识实践^{*}

——兼论中国社会学史的书写

李钧鹏 周 港

提 要：如何书写社会学史？围绕社会学思想及其外部脉络的关系，社会学家的立场往往有内外之别。内部主义侧重于思想内在的、自然的、具有逻辑关系的自我演变，外部主义则强调外在因素影响思想变迁的社会过程。两种立场各执一词、难分高下。近年来，随着新一代观念社会学的兴起，社会学史的研究重心开始从内外之分转向作为二者中介的知识实践。这种走出内外之分、转向知识实践的书写思路，为中国社会学史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社会学史 思想史 观念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 知识实践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 1916: 413）在一个世纪前曾自信地宣称：“一门不愿遗忘其奠基人的学科是迷失的学科。”不过，至少在社会学界，这种极端立场并未成为主流。时至今日，梳理整个学科或其内部特定领域的发展历程已成为大部分社会学家认可的重要任务（阎明，2010；Sica, 2012, 2020）。但社会学史应该如何书写，却不仅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罕见深入的思考。在默顿（2015: 5）看来，“认识到社会学的历史与体系之间的差异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史著”。他不无惋惜地指出，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史所持有的观念往往既非历史也非体系，而不过是一种缺乏深思熟虑的混杂物；他们把注意力局限在已出版的理论体系著作上，认为社会学史是一种对若干已发表思想的评论性概述外加主要学者小传的杂集，但这些学说的公共档案并不能重建思想发展的真实过程（默顿，2015: 5—7）。考察通行的社会学史著作和教材（大泽真幸，2021；贾春增主编，2018；郑杭生、李迎生，2000；Bottomore & Nisbet, 1978；Calhoun, 2007）则不难发现，默顿的观察虽然出自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脉络与体系重建研究”（项目编号：18BSH014；主持人：李钧鹏）阶段性成果。

半个多世纪以前，但如今依旧切中要害。相较于社会学家，科学家更早地认识到科学理论的历史和体系所需要的原始材料有所不同。不少科学史研究者学习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科研人员进行个人与小组访谈，以此搜集科学发展的口述史材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默顿，2015：5—11）。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上，出现一批重要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既有社会学分支领域的述评（张静主编，2019），也有一批围绕学科重建的口述史料和档案资料（南开大学社会学系，2019；周晓虹主编，2021）。如果对不同研究领域的回顾是梳理社会学分支知识所需要的历史背景，那么口述史料和档案资料就是撰写中国社会学史所要求的基本材料。在持有宝贵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如何书写在理论和方法上均具有自觉性的中国社会学史，将是这一代中国学者面临的重大任务（张龙，2021：297），也是本文力图有所贡献之处。

一、科学史的“内外之分”

默顿对社会学的历史、体系以及所需基本材料的区分，持久启迪着社会学史的探讨（Camic, 2010; Jones, 1983; Sica, 1997）。尤为重要的是，默顿雄辩地说明，科学史的相关论述对于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大有助益。在讨论撰写美国社会学史所面临的问题时，艾伦·西卡（Alan Sica）对科学史家表示羡慕，因为他们追随科学史巨匠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进行了档案爬梳的学术训练；并哀叹社会学未曾拥有自己的萨顿，来为构建可靠、全面并有穿透力的学科发展史指明道路（Sica, 2007：713）。而要书写具有穿透力的社会学史，科学史首先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内史”与“外史”

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这部被伊恩·哈金（Ian Hacking）誉为世所罕见的巨著在第一章首段声明：

如果不把历史仅仅看成逸事或年表的贮藏所，历史就能彻底改变现在支配我们的科学形象……本书旨在概述一种非常不同的科学概念，这种概念可以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录中产生。（库恩，2022：49）

他接着指出，将科学发展视为科学知识逐渐累积过程的传统编史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挑战，而科学史正在爆发一场编史学革命。通过阐述新科学史的含义，库恩（2022：50—52）勾勒出了科学发展的新形象——科学革命。

在论述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时，库恩（2004：3）强调自己是执业的科学史家，是美国历史学会会员，而非美国哲学学会会员。《科学革命的结构》对科学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这部著作所引起的一系列有关历史的讨论，库恩在1968年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科学史》一文中专门论述了科学史中的“内史”与“外史”，并正面澄清了内部进路与外部进路：

把知识作为科学实体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内部进路”……把科学家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群体，关注他们的活动，这经常称之为“外部进路”，这是“内部进路”新的对立面。（库恩，2004：110）

此后，科学史界对于“内史”与“外史”的讨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与库恩此时所谈及的两种科学史书写传统和当下的说法稍有不同（吴以义，2020：30，32）。刘兵（2021：39—43）分别梳理了两种科学史书写传统的代表人物，阐明了目前关于“内史”与“外史”更广义的理解。他认为萨顿和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科学史研究可归为标准的“内史”，鲍里斯·黑森（Boris Hessen）和默顿则是“外史”的代表人物；科学史中的“内史”论者强调科学的发展过程主要是由科学自身独立的、内在的逻辑推动制约的，“外史”论者则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外部环境对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的影响。

（二）“内外之分”的消解

“怎样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库恩，2004：110）柯瓦雷曾赞许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将过去分离的科学“内史”和“外史”结合在一起。库恩（2012：287—289）却意识到：“我总是想看到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但我觉得它们仍然几乎是天各一方。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困难……”。

为了与传统知识社会学和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科学社会学相区别，20世纪70年代中叶崛起的爱丁堡学派自称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与传

统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区别直接反映在它们相关的科学史研究中，以及对“内”“外”史的不同侧重（刘兵，2021：49）。传统知识社会学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仍然坚持“内史”传统。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各种“文化科学”是由历史与社会情境决定的，“精确科学”的内容则不受各种历史与社会方面因素的影响（曼海姆，2013：180，293）。科学社会学家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的“外史”研究，但他们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类：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活动以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逻辑结构，并认为社会条件仅能影响前者，没有迹象表明客观条件能实质影响到后者（本-戴维，2020：1—17）。

可见，在科学社会学中，“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线依然十分清晰”（刘兵，2021：49）。爱丁堡学派成员并未心甘情愿地限制自身的研究范围，他们直接触及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将其纳入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布鲁尔，2014：1—2）。由于科学“内史”关注的科学知识内容与逻辑本身也受到了社会因素无孔不入的影响，“内史”与“外史”的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巴恩斯，2001：138—172；Shapin，1982）。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内外之分的消解，日后成为新观念社会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社会学史的“内外之分”

（一）社会学的“外史”

《科学革命的结构》及其对“新科学史”的倡导不仅塑造了“新社会学史”的编史学思路（Jones，1983：463—464），其对“内”“外”史的区分以及对二者间张力的探讨也影响了社会学史的书写（霍松，2018：4—6）。在梳理法国社会学学科成型之前的历史时，约翰·海尔布伦（Johan Heilbron）区分出内部路径与外部路径。内部路径着重文本的阅读、比较和阐释，认为文本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的逻辑发展过程，因此可以通过文本间的关系来理解文本；外部路径则强调情境的重要性，指出理解文本的出发点是探究外在于文本的存在要素（如作者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场景）与文本间的关联（Heilbron，1995：8—10）。到了20世纪80年代，伍尔夫·莱彭尼斯（Wolf Lepenies）和彼得·韦恩加特（Peter Weingart）注意到，“外化”的学科史已蔚然成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撰写的社会调查

史便是其中典例 (Lepenies & Weingart, 1983: xvi)。虽然相关研究浩如烟海,但社会学的“外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路径:宏观脉络路径、互动路径和制度路径。

1. 宏观脉络路径

第一种路径下的社会学史研究将这门学科及其思想流派的发展置于外部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中考察 (Morris, 2015: 176)。例如,20世纪30年代见证了大萧条、美国“新政”以及德国纳粹政权的兴起,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对社会学的影响不可忽视。相较于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和40年代的复兴,多数美国社会学家羞于启齿这门学科在30年代遭遇的“滑铁卢”。与同时期其他学科的学者相比,美国社会学家在大萧条和“新政”时期对公共议题的关注较为迟缓,在运用专业知识应对这些议题时仅扮演了次要角色。尽管随后社会学家积极推动组织机构和研究议题的转向,但未能扭转当时社会学的边缘地位 (Camic, 2007)。同时期德国纳粹政权的上台也波及到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德国社会学家一方面在语言和认识论上借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关键概念,一方面运用专业概念和方法调查第三帝国领域内各类群体的日常生活 (Grüning, 2020)。

战争和帝国也是社会学“外史”格外关注的两种宏观社会脉络。安妮·沃菲尔德·罗尔斯 (Anne Warfield Rawls) 发现定性研究在二战前颇受重视,但美国社会学在二战期间形成一种战时叙事,这种叙事批评定性研究有损于社会学的科学地位,指责定性研究使社会学在战争期间沦为无能学科。战争结束时,定性研究已经被贴上了主观的、不科学的污名标签 (Rawls, 2018)。社会学家常将社会学的创立看作是对工业化及其问题的回应,石桥 (George Steinmetz) 和朱利安·郭 (Julian Go) 却将社会学的产生置于帝国主义而非工业化的脉络之中。社会学不仅在帝国中诞生,而且为帝国服务;社会学不但是“帝国之子”,其专业知识还被用于处理殖民地的社会问题 (Go, 2013, 2020; Steinmetz, 2013, 2023)。

2. 互动路径

如果说前一种研究路径与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论题一致,即探究处于某种历史与社会情境之中的思想 (曼海姆, 2013: 2—3),那么后两种路径就对应了科学社会学中的互动路径与制度路径 (本-戴维, 2020: 1—17)。与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不同,科学社会学侧重考察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因素 (克兰, 1988: 10)。针对同一个议题——科学知识的增长,互动路径指出,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交流网络或者

说“无形学院”促成了科学知识的扩散（克兰，1988：20—37）；制度路径则强调两类条件的作用：一是对科学的支持水平，二是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系统（本-戴维，2020：215—234）。

与科学社会学中互动路径的观点相似，默顿（2003：65—66）相信，“像其他科学家和学者间的作用模式一样，社会学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将会影响这个学科变化着的特征”，因而探讨这些问题有益于撰写“关于社会学之社会学史专著”。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从知识社会学家视角出发，分析了诸多社会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命运。受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的“社会圈子”概念的影响，他考察了社会学理论家的社会关系网，包括他们在“圈内”主要的朋友、对手以及受众（科塞，2007）。珍妮弗·普拉特（Jennifer Platt）批评了社会学史研究中的不平衡现象：学科史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观念史。在其经验研究中，普拉特（Platt，1996：6—7）考察了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从1920至1960年的转变，指出解释研究方法的整体变迁轨迹需要关注真实的社会学家群体，而非科研资助和流于表面的学派。

3. 制度路径

社会学史的制度路径重点关注社会学的研究资助和组织机构。社会学的学科结构和知识生产与社会学家可获得的资源属性和数量密切相关，而资源基础的不断变动和学术机构的碎片化使得美国社会学未能成为一门统一连贯的学科（Turner & Turner，1990）。对于接受资助的社会学研究而言，学术取向又难免受到资助方利益的影响。随着研究技术渐趋复杂，耗资日渐增大，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社会学研究逐渐被科层机构“征用”，包括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广告和市场部门、30年代的企业和综合民调机构、40年代之后的学术研究机构以及二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部门（米尔斯，2017：141—148）。随着新型科层机构的兴起，包括工业关系中心，大学里的研究部门，企业、空军和政府中的新设研究分支，美国社会学的实用取向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学者们不再关注社会底层，而是转向社会顶层的精英，尤其是工商经理和掌管大笔预算的军队将领（米尔斯，2017：133）。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对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教研机构也做了历史梳理，如对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和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Abbott，1999；Nichols，1998；Plummer，2014）。不仅如此，也不乏以国际社会学会、英国社会学会等学术组织为对象的优秀研究（Platt，1998，2003）。

（二）社会学的“内史”

与“外史”相比，从思想内部考察社会学发展轨迹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但仍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精彩分析，我们不妨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来进行回顾。首先，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是内部主义深化的阶段，以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研究为代表。1937年问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尽管“首要地并不是想要成为一项思想史的研究”（帕森斯，2012：22），而是要构建起一种唯意志论行动理论，强调这个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发展，以及有关经验事实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之间的相互促进，但该书串联起一条时间跨度相当大的思想史谱系，为集中讨论的四位理论家留出或指明位置，从而呈现为一份关注点极为明确的社会学思想史研究（赵立玮，2015：9），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里，《社会行动的结构》逐渐被视为最为详尽的社会学史（亚历山大，2003b：121）。帕森斯（2012：6）同时注意到，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皮季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也频繁使用“内在”（immanent）这一表述。在其1928年出版的社会学理论史《当代社会学理论》和30年之后的姐妹篇《今日社会学理论》中，索罗金（Sorokin，1928，1966）致力于挖掘当时的社会学理论流派与古典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探究新旧理论相似程度的做法被默顿（2015：13—42）继承和发展，他将科学史中的知识连续性和间断问题引入社会学史，并区分了重新发现、先前发现、预见和预示等现象，倡导社会学史家分析社会学历史中新旧思想的连贯性，确认新思想依赖过去思想而得以发展的具体方面。

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史的“外化”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内部主义严重衰落。一直到20世纪末，除了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等少数人的研究^①外，内部主义路径乏善可陈，绝大多数社会学史（特别是社会学理论史）沦为仅仅按照时间线索追溯的“人物思想堆砌史”。

21世纪以来，社会学史研究重新沦为社会学的边缘地带，但内部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却有所突破。在讨论社会学的演变时，阿伯特（Abbott，2001：4）直言：“与当下大多数外部主义观点相比，我的解释是内部主义的……我把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看作是在其自身规则下的多少有些自主性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知识变迁是一个“分形区分”的内部过程：社会学家使用一种二元对立的语言区分学术

^① 例如《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亚历山大，2000）、《世纪末社会理论》（亚历山大，2003a）、《新功能主义及其后》（亚历山大，2003b）。

群体，每个群体内部又复制了这种区分（Abbott, 2001: 10）。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学处于“冲突”与“共识”的大争论中。虽然这场争论以冲突理论的胜利告终，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冲突理论又裂变为冲突视角下的共识学派（即理性选择理论）与纯粹的冲突学派之间的对立（Abbott, 2001: 17—18）。亚历山大（Alexander, 2001: XXII, XL）将社会学定义为“有关社会及其构成性单元的多种理性话语，每种话语的模式和方向受制于组成学科主流传统的学派”；学派的传统地位是否会受到外部组织力量和物质资源的影响并不重要，研究每个传统如何围绕着社会学正典、批判性话语和研究纲领演变与竞争才是关键。亚历山大关注的是“一般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文本的自主性”，而不是“观念的社会基础”；强调的是“知识社会学永远不能取代对知识的分析”（Camic, 1996: 177）。

（三）社会学史的内外之争

至少在20世纪下半叶，“内”“外”史之间的张力始终居于科学史讨论的中心。在社会学界，内外之分虽不是持久的核心议题，但也引发过部分学者的争论。1992年，在一篇研究帕森斯的学术轨迹的论文中，查尔斯·卡米克（Charles Camic）探讨了学者对于其学术对话对象的选择。他指出，学者在选择其“学术先辈”或定位其学术传承时，并不只是考虑学术思想在内容上的契合程度，而会有其他外部因素的考量，并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声誉模型。声誉模型关注的不是观念的内容，而是社会制度的情境（Camic, 1992）。卡米克（Camic, 1992）认为，帕森斯之所以在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选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这些欧洲理论家而非美国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作为学术先辈，主要原因并非这些人的理论与帕森斯的研究存在思想上的内部关联，而是基于声誉上的考量。亚历山大和朱塞佩·肖尔蒂诺（Giuseppe Sciortino）在四年后撰文，认为卡米克持外部主义立场，而外部因素从来不足以解释理论的选择；外部主义的局限使得卡米克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在卡米克最关键的论述中，他放弃了声誉模型，转而采用了曾被其批判的内容契合模型（Alexander & Sciortino, 1996）。

在措辞强硬的回应文章中，卡米克（Camic, 1996）指出，亚历山大所提出的分析学术知识演变的工具基本上都是反社会学的，尤其在分析对象是植根于创造性的、特殊的、内在的力量并超出社会领域的“伟大社会科学”时。卡米克将自己的学说

命名为“观念社会学”（sociology of ideas），意在与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做出区分：“知识”一词专指真实的事实陈述，而观念社会学关注更广泛的思想产品，如社会思想家提出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他看来，亚历山大和肖尔蒂诺对他的指责将知识社会学和观念社会学混为一谈。此外，卡米克批评亚历山大忽视了科学社会学的最新进展，不加批判地执着于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之间不可信的、过时的区分；而科学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内外之分。这场论战至此偃旗息鼓，但它所留下的“草蛇灰线”，例如科学社会学的启示、观念社会学的主张以及思想史与学科史的内外之分，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编史学的实践转向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学史的实践转向

（一）新观念社会学

2001年，卡米克和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将诸多晚近研究置于“新观念社会学”（new sociology of ideas）范畴，并提出一系列纲领性主张。新观念社会学关注从事生产科学、道德、政治、审美等观念的知识分子，探究观念产生、发展和变迁的社会过程（Camic & Gross, 2001）。以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旧观念社会学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1）观念社会学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2）接受内外之分；（3）观念具有透明性；（4）关注宏观社会因素；（5）知识分子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范畴。新观念社会学的基础原则与之截然不同：（1）观念社会学本身即为目的；（2）反对内外之分；（3）观念嵌于社会与思想脉络中；（4）关注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地方性情境；（5）强调场域及其内部斗争。其中对内外之分的摒弃尤为关键。

旧观念社会学家并未质疑“内部”观念内容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分。他们认可存在一个能够内在地决定观念内容的非社会领域；外部社会因素仅被用于解释某些观念兴盛衰落或被思想家青睐的原因，而不能染指思想的内在实质。正如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所指：受到社会决定的只是对各种知识对象的选择过程；所有知识的内容及其客观有效性不受社会结构的制约（舍勒，2014：73）。新观念社会学对内外之分的拒绝受到了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尤其是戴维·布鲁尔（David Bloor）所倡导的科学研究“强纲领”。在布鲁

尔 (2014) 看来, 科学发现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社会性, 因而不存在一个能够内在地决定科学观念的非社会领域; 对科学而言, 外部制度因素和内部观念因素都是社会性的。由此, 史蒂文·夏平 (Steven Shapin) 直言内外之分是不合理的 (Shapin, 1992: 349), 知识内部的社会维度同样需要关注 (Shapin, 1995: 300)。在其经验研究中, 格罗斯 (Gross, 2002: 60—61) 也试图打破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的区分, 强调“社会过程对于知识来说既是内在的, 也是外在的”。

(二) 实践转向

2020年, 格罗斯和克里斯托弗·罗伯逊 (Christopher Robertson) 回顾了观念社会学在21世纪前20年的发展轨迹, 将2011年视为观念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点, 因为卡米克、格罗斯和米谢勒·拉蒙 (Michèle Lamont) 在这一年公开倡导观念研究的“实践转向” (turn to practice) (Gross & Robertson, 2020: 447—448)。在论文集《发展中的社会知识》的序言中, 卡米克、格罗斯和拉蒙 (Camic et al., 2011) 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推动的“实践转向”引入社会知识生产的研究中。对社会知识生产、评估和应用的研究此前一直是知识社会学关注的议题: 知识社会学家追溯已知观念的外部社会起源, 这些外部社会来源通常被概念化为宏观层面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以及思想家的阶级利益或群体利益。三人批评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路径隐含了一个输入/输出模型, 即社会宏观因素作为输入项, 已完成的思想作为输出项。这种模型忽略了中介项——社会知识生产者从事制造、评估和传播各类社会知识的日常行动和过程, 这类行动和过程就是实践 (Camic et al., 2011: 6—7)。脉络性、互动性和制度性的社会因素在实践过程中相互调节 (Gross & Robertson, 2020: 448)。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纪80年代晚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发生的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的实践转向, 是对20世纪70年代早期“强纲领”的反思与突破 (皮克林, 2006)。考虑到卡米克与格罗斯在“新观念社会学宣言”中援引“强纲领”来反对内外之分, 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知识研究的实践转向是这些新观念社会学家在打破内外之分后确立的一条承前启后的研究路径。

作为一项跨学科工作, 卡米克、格罗斯和拉蒙于2011年邀请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系统地思考知识生产、评估与应用领域的实践, 并以《发展中的社会知识》为最终成果。2014年, 三人反思了这本论文集出版后的命运, 讨论了其在社会学和相关学科的反响。三位学者的结论是: “虽然我们对结果满意, 但我们也觉得这本书

没有得到我们所希望的强烈反响。”（Camic et al., 2014: 2）到了2015年，卡米克（Camic, 2015）明确提出，实践转向应拓宽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史研究中。他批评社会科学史和人文学科史研究者忽视了社会思想家和人文学者在发展其观念时所从事的日常实践，这与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实践转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已经分析了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学术实践。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历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实践转向的苗头，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者可以通过拓宽实践转向来丰富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卡米克关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十年磨一剑”之作于2020年出版。这本著作旨在探究经济学知识的历史，并为此搭建了一个包括场域、知识实践、场域进入与有变化的重复等概念的理论框架，其中蕴含了观念社会学近20年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理论主张。卡米克（Camic, 2020: 26）指出，知识生产的内部主义解释和外部主义解释之分是一种人为的、似是而非的划分，并且早已耗尽了它的价值，并主张将社会科学史与人文学科史的研究重心从内部与外部因素的争论转移到连接这两种因素的中介，也就是知识实践。

四、知识实践的理论与方法

（一）一个知识实践的理论框架

新观念社会学的实践转向关注社会知识的生产实践、评估实践和应用实践。基于这种实践转向，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学家知识实践形成与运用的理论框架，并阐明相应的方法论主张。理论框架的研究问题是：社会学家是如何获取、积累和运用知识实践的。基于李钧鹏（2011b）对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理论框架以及卡米克（Camic, 2020: 25—50）在知识生产者积累和运用知识实践方面的理论主张，我们提出了一个由以下核心概念构成的理论框架：知识实践、知识场域、习性、自我概念、亚文化认同、生命历程以及有变化的重复。

1. 知识实践

知识是学者在思考后得出的一系列陈述。这些陈述既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规范性的；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既可以是经验性的，也可以是理论性的；既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这些陈述常常被归于“观念”的范畴（Camic, 2020: 29）。知识实践是知识生产者在工作时所采取的行动、观察、思

考和判断方式，例如建立一个论点或应用一套概念的方式；这些实践为知识生产者提供了一个“剧目”或“工具箱”，使他们能够运用手头的知识实践“工具”在知识场域中处理常规或非常规的问题（Camic, 2020: 30）。知识场域、习性、自我概念、参照群体和生命历程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知识实践的形成。

2. 知识场域与习性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知识场域”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并研究了科学与大学场域。在他看来，知识场域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知识场域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微观宇宙，由知识制造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构成。知识制造者在知识场域中的位置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本类型与数量，资本的分配结构决定着知识场域的客观结构。其次，知识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为了维持或改变现存的客观分类结构，不同层级的成员之间存在斗争，斗争的目的以及为此采取的策略往往取决于他们在知识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布尔迪厄，2006；布赫迪厄，2019）。

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场域都对应着特定的习性。按照布迪厄（2012: 73、76）的定义，习性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该系统构成于实践活动，并总是趋向实践功能”；习性确保“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动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在对科学场域的研究中，布尔迪厄（2006: 65—76）强调，引入“习性”概念可以确立科学实践^①的基本原则：习性是一种“技能”，一种处理问题的实践意识和适当方式；科学实践的真正根本是科学家的各种无意识、可转换、生成性的习性；这些习性因不同的学科场域或大学场域而异，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实践模式。由此，产生习性的知识场域借助习性生成、约束和限制知识实践。

3. 自我概念与亚文化认同

场域和习性有助于我们理解知识实践的社会性，但难以解释知识生产者如何主动获取知识实践。这种结构主义倾向忽视了动机问题，导致了一种过度社会化的个人概念。我们以“自我概念”来解决社会行动与意识的动机问题。自我概念既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又由社会性的动机所驱动。与自我概念相联系的动机可以分为三种

^① 布尔迪厄对科学实践的看法与卡米克同源。布尔迪厄（2006: 66）将自己的科学实践观点追溯至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卡米克（Camic, 2020: 371）直言其实践定义源自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论述，而皮克林（2006: 4）将波兰尼视为科学研究实践转向的先驱之一。

类型：自尊动机、自我效能动机与本真动机。自尊动机是对自我持正面看法并维系和强化这种正面评价的动机；自我效能动机是个人希望对其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本真动机指个人对内在连贯性意义的追求（李钧鹏，2011a：48—49）。在动机产生之后，自我概念将对个人的行动产生深远影响，而个人也试图维系和强化这一概念，并在经历、维系、修正自我概念的过程中获取意义与真实感。

在引入“自我概念”后，我们就能够借助上述三种动机来解释知识生产者如何主动习得和获取知识实践（李钧鹏，2011b，35—36）。下面是有关知识实践的选择与获取的七个初步命题：

（1）每个人都具有本真动机，寻求意义与归属感是人类本性，这主要通过将知识生产者自我置于社会群体中，并维系后者特有的群体认同而得到满足；

（2）出于自我效能动机，知识制造者群体通过划分象征性边界来区分自我与他者，以此来构建和维系群体认同；

（3）加入某个群体的个人选择强化了知识制造者的自尊动机，其身份认同经由后者所强化后将赋予知识制造者以更强烈的认知与行动动机；

（4）基于自尊动机与自我效能动机，知识生产者和知识生产者群体参照其他知识生产者和群体来选择和获取自己的知识实践；

（5）参照群体包括类似的群体与对立的群体，前者作为正向参照群体强化知识生产者的自我概念，而后者作为负向参照群体有两种可能的后果——在知识制造者的自我概念尚未成型时对其弱化，或在自我概念成型后对其强化；

（6）知识制造者群体与学派的多元化在量的方面减少了特定群体的人数，在质的方面却通过自尊动机与自我效能动机的提升，强化了特定知识制造者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自我概念；

（7）知识生产者之间的冲突和论战往往会强化知识生产者的自尊动机、自我效能动机与本真动机，这将强化他们本已形成的知识实践，并动员和增强成员的团结感。

4. 生命历程

同样，我们不可忽视知识实践的时间维度。知识生产者接受学术训练的时长不一，或长或短，或连续或中断；这种教育经历的开始时间也有早有晚；教学活动的

先后次序也不尽相同。生命历程研究已经表明，生命事件的持续时间、发生时间和先后次序对事件的经历者有着深远影响（Elder & Conger, 2000; Shanahan, 2000）。虽然卡米克和格罗斯分别在经验研究中指出了个人生活经历的重要性：卡米克（Camic, 1983）提醒我们留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化过程；格罗斯（Gross, 2008）揭示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个人生活与学术经历，但这些知识生产研究并未强调生命历程中的时间因素。

由此，卡米克（Camic, 2020: 39）认为“知识生产是一个攸关时间的过程”，主张关注知识生产者的早期教育经历，其间教育事件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以及先后顺序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知识制造者拥有迥异的知识实践库（Camic, 2020: 34）。与卡米克仅关注早年教育生涯不同，我们认为从学生到成熟学者这段生命历程中的时间因素，比如学术教育和学术职业的开始时间、各个教育阶段和职业阶段的持续时间以及这些阶段的先后顺序，都影响了知识生产者所掌握和积累的知识实践。

5. 有变化的重复

如果知识场域、习性、自我概念、亚文化认同以及生命历程塑造了知识生产者的知识实践，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运用这些实践的？卡米克（Camic, 2020: 40—42）主张将知识制造者的知识实践与他们在知识场域中生产的知识联系起来，“有变化的重复”则是联结两者的关键概念。当知识生产者运用知识实践处理问题时，他们发现自己手头的知识实践“工具”不仅适用于单个的问题，还可以在广泛的问题中转移和调换，为多种知识目的服务。知识实践是灵活的、可扩展的、多用途的。通过有变化的重复，知识制造者调用其已有知识实践在知识场域中应对新问题，生产新知识甚至参与学术论战。

卡米克对凡勃伦思想历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知识实践、知识场域、习性、生命历程和有变化的重复这些概念的运用。在求学阶段，凡勃伦从不同的知识场域中接受各种知识实践训练。学徒期结束时，他已经掌握了一个经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知识实践“工具箱”，其中包括将世界视为不断变化的实践、将世界视为整体范畴的实践、重视生产性工作的实践以及崇尚新知识形式的实践。进入经济学场域后，凡勃伦重新调整、组合这些知识工具，并将它们转用到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上。运用这些知识实践，他巧妙地将边际主义批判为具有先验论、原子论与非历史主义色彩，指责该理论忽视非生产性活动，并将自己的理论构建为一种归纳的、制

度的、进化的理论，并且关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对立（Camic, 2020: 358—363）。而在格罗斯对罗蒂的研究中，自我概念与亚文化认同这两个概念得到了较好的展现。格罗斯提出了知识分子自我概念理论，认为思想家在其生命历程中曾隶属不同的学术组织，会从中汲取身份认同元素，并将其整合到自我概念中。例如，罗蒂之所以与势头强盛的分析哲学决裂，转而拥抱实用主义哲学，他的“左翼美国爱国者”自我概念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父母的离世、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其他的历史进程，罗蒂重新激活这个在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受父母影响而获取的身份认同。“左翼爱国者”的自我概念引导他走向在美国思想传统中地位超然的实用主义哲学（Gross, 2008: 277—332）。

将上述概念与命题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关知识实践形成与运用的理论框架（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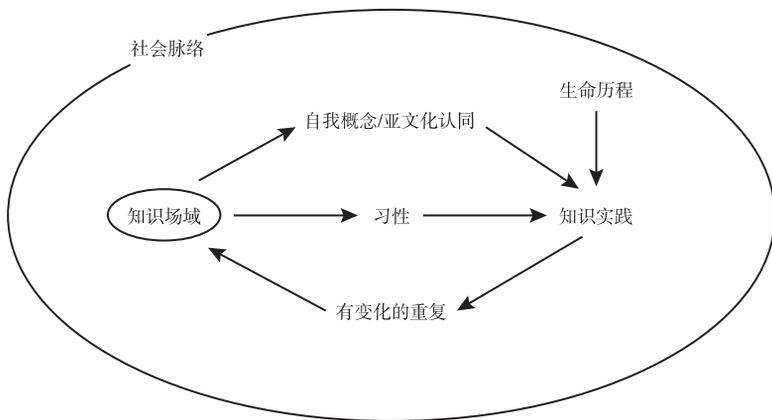


图 知识实践的形成与运用

这个理论框架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其旨在解释知识生产者知识实践的形成与运用，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上半部分，习性、自我概念、亚文化认同以及生命历程都直接形塑了知识生产者的知识实践；在下半部分，通过有变化的重复，知识制造者运用其实践处理知识场域中的问题。其次，卡米克（Camic, 2011: 8）指出在知识实践中存在着转因为果的机制或过程，李钧鹏（2012: 15）强调其原有框架展示了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形成的社会机制，我们构建的理论框架同样提供了多层次机制解释。习性将知识生产者的实践模式与其在知识场域中所处的位置联系起来；知识制造者往往基于参照群体来获取特定的知识实践，而自我概念与亚文化

认同在其间建立了因果关联；有变化的重复揭示了从知识实践到知识生产的因果过程；学术教育阶段与学术职业阶段的开始时间、持续时间和先后次序则代表了时序性的机制解释。最后，这些因果机制受到特定脉络的影响。斯廷奇库姆（Stinchcombe, 2012: 139—174）指出，脉络是宏观的社会结构，不同脉络中因果机制转因为果的效应存在差异。

（二）传记资料

考察知识制造者如何掌握其知识实践的最好资料可能就是传记叙述（Camic, 2020: 34—35）。将“个人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通过社会学家的个人生命历程回顾学科发展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关键线索（高玉炜、周晓虹, 2021）。将学者的人生史及其研究的谱系学相结合，是深挖社会学史的重要步骤（田耕, 2023: 112）。普拉特梳理过以传记、自传和自传集为资料的社会学史研究，并考虑了此种方法可能遇到的问题。她指出，传记不是一种资料收集方法；传记的资料可能包括档案文件、参与式观察、非结构访谈或征集的书面生活史（Platt, 2017）。一份传记往往涵盖一个人或一个小群体的生命历程；一个研究常常聚焦生命史中的一个特定主题。由此，基于传记资料的社会学史研究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关注哪些人的传记资料？第二，处理传记资料时从什么角度出发，解决什么历史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普拉特（2017: 156）指出，最普遍的趋势是将历史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公认的、学术地位高的社会学家，或是那些值得受到更多认可的人物，因为这些杰出的学者们往往被公认为整个学科的代表，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展现其所处时空的典型特征。2006年，西卡和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编辑了一部由19位社会学家自传体陈述组成的著作，这些社会学家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其中包括阿伯特、亚历山大、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和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应邀为该书撰稿的学者都出生于1944至1951年之间，因此，他们进入社会学的时间接近被称为“六八事件”的文化大爆炸时期，这可能是二战后社会科学最动荡的一年。西卡与斯蒂芬·特纳相信：

“六八一代”的学生所经历的教育和文化体验，明显地将他们与之前的学生和几年后的学生区分开来……因为从那时起，这些现已成熟和受人尊敬的学生

者的学生经历以特殊的方式塑造了他们的观点和发表的作品。(Sica & Turner, 2006: x—xi)

除了特定历史事件和阶段外,学者的生命历程对知识生产同样影响深远。2019年,周晓虹的研究团队开启了对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基于口述史料,他发现其中32位学者在青少年时代都有近似的生命历程和个人体验,他们对包括农村及工厂在内的基层社会有着广泛了解,可以被称为“知青”社会学家,而“知青”一代社会学人独特的个人生命史影响了他们的知识生产和话语实践(周晓虹,2022)。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取决于各项社会学史研究的问题选择(Platt, 2017: 163)。社会学家的知识实践是如何形成和运用的?卡米克(Camic, 2020: 37—38)区分了涉及这个问题的三种传记叙述:河流叙述、分水岭叙述和悬崖叙述。河流叙述将主人公的生命史描述成一股席卷着各种事件的洪流:主人公父母的宗教信仰、当时政党的意识形态、受同代人欢迎的书籍等。分水岭叙述关注生命轨迹的重大转折,尤其是那些使主人公转向全新的观察与思考方式的事件或环境。悬崖叙述中的主人公在社会和思想方面与同代人相互隔离,以旁观者敏锐的眼光超然地观察当时的思想界,并宣扬脱离主流的异端思想。虽然这三种传记叙述都涉及知识生产者知识实践的形成,但是卡米克(Camic, 2020: 42)认为这些传记叙述并未充分考虑到生命历程的时间性和知识实践的应用,由此,他主张关注第四种传记叙述隐喻:不是河流、分水岭或悬崖,而是水库。在自然界中,水库是一个蓄水区域,容纳着众多河流汇入其中的资源,而生物从中获取它们生存所需。同样,知识生产者通过不同的经验渠道形成、习得和积累他们的知识实践。在知识场域中面对问题时,他们会从知识实践“工具箱”中灵活地取用这些“工具”。所以,考察知识实践的形成与运用需要我们聚焦传记资料中的水库叙述。

五、中国社会学史的书写

关于知识实践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主张有助于思考中国社会学史的书写。参照前述几种理解和书写社会学史的思路(见下页表),我们扼要总结了中国社会学历史研究的五种路径。

表 社会学史的不同思路

类别	思路		
评述性历史	按年代或流派对关键思想进行概括和点评		
分析性历史	内史	社会学史是内在的、自然的、具有逻辑关系的自我演变	
	外史	社会学史是受外在社会因素影响的社会过程	宏观脉络路径
			互动路径
实践	关注社会学家知识实践的形成与运用		

默顿（2015：5）曾指出，由于混淆了学科的历史和体系，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史往往抱有一种狭隘的、匹克威克式的观念：把社会学史看作是一种对以往思想的评论性概述。这种书写思路“把历史仅仅看成逸事或年表的贮藏所”（库恩，2022：49），无法重现社会学发展的真实过程。只有认识到社会学在历史和体系上的差异，我们才有望写出真正的史著，这类社会学史会涉及社会学思想的承继关系、理论与社会组织的相互作用、理论与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关系等问题（默顿，2015：5）。由此，可以将社会学史的书写思路划分为评述性历史和分析性历史。我们不拟在概念辨析上多费笔墨，而是以这种类型划分来简略考察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

首先，部分研究往往以历史分期（韩明汉，1987；杨雅彬，1987）或主要流派（李培林、渠敬东，2009；孙本文，2011；郑杭生、李迎生，2000）为分类标准，评述各类别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在前者中，韩明汉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发轫期（1891—1910年）、萌芽期（1911—1918年）、幼苗期（1919—1927年）、成长期（1928—1948年）和改革期（1949年至今），重点介绍了各个时期内社会学的思想动态（韩明汉，1987）。在后者中，李培林和渠敬东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划分为五种思想流派：唯物史观社会学、乡村建设和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学的“学院派”以及社会史研究，概述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李培林、渠敬东，2009）。这类评述性历史研究发挥着教材的功能，同时在维系学科的历史记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次，如前所述，默顿通过预见、预示、预示主义、重新发现等术语区分早期思想与近期思想的相似性，分析社会学知识的内在连续性。其中，预示主义意味着有目的地探寻学术思想各类早期表述，全力发现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的一致性（默顿，2015：32）。例如，索罗金（Sorokin，1928：437）发现，几乎所有的当代社会学理论流派都起源于遥远的过去，流派的核心原则都可以追溯至社会思想史

的源头。这种“内史”进路也见诸部分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刘少杰（2007）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康有为承继的晚清今文经学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发端，严复译介的西方实证社会学则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发端。景天魁等（2017）更是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起源追溯至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本土社会思想传统，指出中国社会学古已有之，并非只是“舶来品”。由此，景天魁（2019）主张以群学命题演进史为主线，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外史”思路主要采取制度路径分析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或探究社会学家的思想发展。例如，国家建设如何引导资源流向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活动，如何为社会学在大学系统的扩张、教学课程的标准化、学科知识的编纂、研究经费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专业团体的合法化提供机会（Chen, 2017）；清华园的教育改革、学生自治运动、国家领袖精英意识、组织团体以及学术研究风气怎样影响吴景超的国家主义观念和他后来的思想走向（方慧容，2022）。

然而，大部分研究者在权衡比较后，选择同时采用“内史”与“外史”两种编史学进路（陆远，2019：20—24；田耕，2019：22—23；闻翔，2018：219），这种书写策略是中国社会学史的主流。学科内在因素、外在脉络性因素以及社会学家之间的互动形态被用于分析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困境（陆远，2019：21—24，30—31；阎明，2010：278；姚纯安，2006：385—387）。这种书写思路也见诸分支社会学史研究，如民国时期劳工社会学的走向（闻翔，2018：219—237）和社会学研究的边政转向（田耕，2019：22；王利平，2016：123—127）。兼顾“内史”与“外史”被这些研究者看作是一种折中后的更优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研究依然暗含内外之分：脉络性、互动性和制度性的社会因素只被用于解释中国社会学或分支社会学的发展态势，而非用来分析社会学思想内容的演变。新观念社会学的主张和研究已经表明，知识的内容并不是一个能够豁免于社会学分析的神圣禁区。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者不应该止步于思想内容的门外；聚焦作为内部与外部因素中介的知识实践有助于打破这种内外之分。

最后，我们明确提出了一种书写思路：基于中国社会学家的传记资料，探究他们知识实践的形成与运用，展现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实际过程，由此走出内外之分、转向知识实践。目前，部分研究者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做出了初步探索。张龙（2021：289—296）叙述了第三代社会学家在“南开班”时期的知识生产实践；周晓虹（2022：141—145）讨论了“知青”社会学人所受的土洋结合、多元杂糅的学

术训练；黄晓星和吴文希（2023）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岭南地区社会学的一系列教学与调查实践。此外，我们倡导的书写路径和理论框架有助于分析已经为部分学者觉察到的历史现象，例如当前中国社会学家代际更迭带来的知识实践变化，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影响（王小章，2021：21—22；项飙，2015：70；周晓虹，2022：157）。正如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观念社会学领域中发生的实践转向，可以预见更多的中国社会学史家将打破内外之分，以知识制造实践和应用实践为研究旨趣。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口述史料与档案资料，已经为这种可能性铺设了道路。

参考文献：

- 巴恩斯，巴里，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 本-戴维，约瑟夫，2020，《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项比较研究》，刘晓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布迪厄，皮埃尔，2012，《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布尔迪厄，皮埃尔，2006，《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陈圣生、涂释文、梁亚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布赫迪厄，皮耶，2019，《学术人》，李沅涵译，台北：时报文化。
- 布鲁尔，大卫，2014，《知识和社会意象》，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大泽真幸，2021，《给所有人的社会学史讲义：跟随大泽真幸一起建立当代必备的社会学素养》，颜雪雪译，台北：卫城出版社。
- 方慧蓉，2022，《社会、经济与政治之间：早期社会学者的徘徊和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高玉炜、周晓虹，2021，《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探索与争鸣》第6期。
- 韩明汉，1987，《中国社会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黄晓星、吴文希，2023，《社会学的日常化建构与知识实践——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
- 霍松，杰弗里，2018，《启蒙与绝望：一部社会理论史》，潘建雷、王旭辉、向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贾春增主编，2018，《外国社会学史》（第3版重排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景天魁等，2017，《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景天魁主编，2019，《中国社会学史（第一卷）：群学的形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克兰，黛安娜，1988，《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刘珺珺、顾昕、王德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科塞，刘易斯·A.，2007，《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库恩, 托马斯, 2004, 《必要的张力》, 范岱年、纪树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2, 《结构之后的路》, 邱慧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22, 《科学革命的结构》, 张卜天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钧鹏, 2011a,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1 期。
- 2011b, 《知识分子与政治》, 《社会》第 5 期。
- 2012, 《何谓社会机制?》,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 1 期。
- 李培林、渠敬东, 2009,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学术史》, 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兵, 2021, 《克丽奥眼中的科学: 科学编史学初论》(第三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少杰, 2007, 《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陆远, 2019, 《传承与断裂: 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曼海姆, 卡尔, 2013,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引论》, 霍桂桓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米尔斯, C. 赖特, 2017, 《社会学的想象力》,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默顿, 罗伯特·K., 2003, 《科学社会学: 理论与经验研究》, 鲁旭东、林聚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15,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唐少杰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社会学从这里起步: 南开社会学早期办学资料简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帕森斯, 塔尔科特, 2012, 《社会行动的结构》, 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皮克林, 安德鲁, 2006, 《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 安德鲁·皮克林编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 柯文、伊梅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舍勒, 马克斯, 2014, 《知识社会学问题》, 艾彦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Stinchcombe, Arthur L., 2012, 《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 谢明珊、徐筱琦译, 新北: 韦伯文化。
- 孙本文, 2011, 《当代中国社会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田耕, 2019, 《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 1928—1947》, 《学海》第 2 期。
- 2023, 《交错继承的学术传统: 以抗战期间的一些边疆研究为例》, 《学海》第 2 期。
- 王利平, 2016, 《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构建: 以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3 期。
- 王小章, 2021, 《学人、学科与时代》, 《读书》第 12 期。
- 闻翔, 2018, 《劳工神圣: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吴以义, 2020, 《什么是科学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项飙, 2015, 《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 《文化纵横》第 6 期。
- 亚历山大, 杰弗里, 2000, 《社会学二十讲: 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 贾春增、董天民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亚历山大, 杰夫瑞·C., 2003a, 《世纪末社会理论》, 张旅平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亚历山大, J. C., 2003b,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彭牧、史建华、杨渝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阎明, 2010, 《中国社会学史: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杨雅彬, 1987, 《中国社会学史》,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姚纯安, 2006, 《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 1895—1919》,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张静主编, 2019, 《中国社会学四十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龙, 2021, 《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以1981年“南开班”为例》, 《中国研究》第27期。
- 赵立玮, 2015,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帕森斯与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社会》第6期。
- 郑杭生、李迎生, 2000,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晓虹, 2022,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话语叙事——以40位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周晓虹主编, 2021, 《重建中国社会学: 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 1979—2019》,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Abbott, Andrew 1999,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Chicago Sociology at One Hund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1,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lexander, Jeffrey C. 2001, “Canons, Discourses, and Research Programs: Plurality, Progress and Competition in Classic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In Jeffrey C. Alexander (ed.), *Mainstream and Critical Social Theory: Classic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ondon: Sage.
- Alexander, Jeffrey C. & Giuseppe Sciortino 1996, “On Choosing One’s Intellectual Predecessors: The Reductionism of Camic’s Treatment of Pars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ists.” *Sociological Theory* 14 (2).
- Bottomore, Tom & Robert Nisbet (eds.) 1978,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 Calhoun, Craig (ed.) 2007,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mic, Charles 1983,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Socialization for Cultural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2, “Reputation and Predecessor Selection: Pars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4).
- 1996, “Alexander’s Anti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14 (2).
- 2007, “On Edge: Sociolog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10, “How Merton Sociologizes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Craig Calhoun (ed.), *Robert K. Merton: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as Sc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15, “Widening the Turn to Practice.” Presented at the 12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 York.
- 2020, *Veblen: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st Who Unmade Econom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ic, Charles & Neil Gross 2001, “The New Sociology of Ideas.” In Judith R. Blau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 Camic, Charles, Neil Gross & Michèle Lamont 2011, "The Study of Social Knowledge Making." In Charles Camic, Neil Gross & Michèle Lamont (eds.), *Social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14, "Looking Back at *Social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Sociologica* 8 (2).
- Chen, Hon-Fai 2017, *Chinese Sociology: State-Building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lobally Circulated Knowledg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Elder, Glen H. & Rand D. Conger 2000, *Children of the Land: Adversity and Success in Rural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 Julian 2013, "Sociology's Imperial Unconscious: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Sociology in the Context of Empire." In George Steinmetz (ed.), *Sociology and Empi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20, "Race, Empire, and Epistemic Exclusion: Or the Structure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Sociological Theory* 38 (2).
- Gross, Neil 2002, "Becoming a Pragmatist Philosopher: Status, Self-Concept,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1).
- 2008, *Richard Rorty: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Philosoph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oss, Neil & Christopher Robertson 2020, "Ideological Diversity." In Colin Elman, John Gerring & James Mahoney (eds.),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Enhancing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üning, Barbara 2020, "Between Politics and Common Sense: The Epistemological and Symbolic Boundaries of Sociology during 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1 (1).
- Heilbron, Johan 1995,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Trans. by Sheila Gogo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Jones, Robert Alun 1983, "The New History of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4).
- Lepenies, Wolf & Peter Weingart 1983, "Introduction." In Loren Garham, Wolf Lepenies & Peter Weingart (eds.), *Functions and Uses of Disciplinary Histories*. Lancaster: D. Reidel.
- Morris, Aldon D. 2015, *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ichols, Lawrence T. 1998, "Social Relations Undone: Disciplinary Divergence and Departmental Politics at Harvard, 1946—1970." *American Sociologist* 29 (2).
- Platt, Jennifer 1996,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in America, 192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A Brief History of the ISA: 1948—1997*. Madrid: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2003,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 Sociologic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2017, "(Auto) biographies as Data for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In Moebius Stephan & Ploder Andrea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Wiesbaden: Springer VS.
- Plummer, Ken (ed.) 2014, *Imaginations: Fifty Years of Essex Sociology*. Wivenhoe: Wivenbooks.

- Rawls, Anne Warfield 2018, “The War Time Narrative in US Sociology, 1940—1947: Stigmatizing Qualitative Sociology in the Name of ‘Science’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1 (4).
- Shanahan, Michael J. 2000, “Pathways to Adulthood in Changing Societies: Variability and Mechanism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 Shapin, Steven 1982,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Sociological Reconstructions.” *History of Science* 20 (3).
- 1992, “Discipline and Bounding: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as Seen through the Externalism-Internalism Debate.” *History of Science* 30 (4).
- 1995, “Here and Everywher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 Sica, Alan 1997, “Acclaiming the Reclaimers: The Trials of Writing Sociology’s History.” In Charles Camic (ed.), *Reclaiming the Sociological Classics: The State of the Scholarship*. Oxford: Blackwell.
- 2007, “Defining Disciplinary Identity: The Historiography of U. S. Sociology.”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12, “A Selective History of Sociology.” In George Ritzer (ed.),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Hoboken: Wiley-Blackwell.
- 2020,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In George Ritzer & Wendy Wiedenhof Murphy (eds.),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2nd Edition)*.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 Sica, Alan & Stephen Turner 2006, “Preface.” In Alan Sica & Stephen Turner (eds.), *The Disobedient Generation: Social Theorists in the Six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orokin, Pitirim A. 1928,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New York: Harper.
- 1966,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oday*. New York: Harper & Row.
- Steinmetz, George 2013, “A Child of the Empire: British Sociology and Colonialism, 1940s—1960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49 (4).
- 2023,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French Sociology and the Overseas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Stephen Park & Jonathan H. Turner 1990, *The Impossible Science: An Institution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London: Sage.
- Whitehead, Alfred N. 1916, “The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Science* 44 (1134).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罗 婧